

◀ （上接 6 版）

时人时刻记住“中国本身拥有力量”[今日接续这一思考的杰出代表当属作为读书人的老编辑钟叔河先生，在推动出版《走向世界》丛书的同时，他的写作却是《中国本身拥有力量》（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，1989 年）]，在这个意义上，唐牟梁三人便不谋而合了。

梁漱溟自 1953 年 9 月以来，至完成《中国——理性之国》（写成于 1970 年，参见《梁漱溟往来书信集》，第 219 页），二十年未能与毛泽东相见，1972 年请托章士钊将书稿转呈毛泽东，有一附件虽未寄出，却足以表露心迹：“拙稿大旨在申论今日中国之所以巍然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先导者”，“其根柢力量固在中国民族自身”（同上，第 119 页）。12 月，梁漱溟取回书稿，26 日亲往中南海西大门，此时距 1949 年献礼新中国已二十三年。

有朋自远方来

1972 年，梁漱溟与冯振心（1897—1983）相晤，承蒙振心索书纪念，漱溟记书，但所记时刻却是一场外交事件——当年 9 月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我国周恩来总理就两国恢复邦交谈判，行将谈定，毛主席接见田中，开口便说“吵架吵完了吧！”梁漱溟的判断是：“此见主席态度轻松风趣，待人亲切，不落俗套。然亦象征了二千年两国友善关系在近八十年短期恶化之结束，今后将永远和睦相处，并为世界和平共同努力。”（同上，第 188-189 页）用这场外交事件记录两个私人的会晤时刻不太合乎常理，尤其是“吵架”一事，很容易让人们想到 1953 年毛梁二人的争吵，只不过结果并不如中日谈判一般，两人再未相见，至行文之时，已二十年之久，梁漱溟心

中是否仍旧期盼重新做回“远方的朋友”？

1976 年，梁漱溟曾手书，忆起 1922 年冯友兰专程由美国寄来的信，其中仔细讨论《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》，1973 年春到梁家午饭，相谈甚久，临别时诵读《论语》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”，“不意秋后他竟以批孔鸣于时”（同上，第 571 页；干春松，《1973 年的梁漱溟和冯友兰》）。无怪乎冯友兰既为梁漱溟承认的“老同学”[梁漱溟从未就读北大，但 1918 年为时值哲学系三年级冯友兰诸生讲授印度哲学（参见《梁漱溟往来书信集》，第 117、168 页）]，却被《梁漱溟往来书信集》的编者归为“有关人士”而非“师友”。

改革开放那年，国外出版了一本有关漱溟的专著《最后的儒家——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》（*The Last Confucian: Liang Shu-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*, 1979）。作者艾恺

（Guy Salvatore Alitto, 1942—）曾在尼克松访华次年作为随团翻译来华，可惜当时因为种种因由无法面见梁漱溟——终于在 1980 年实现心愿。1980 年拜访梁漱溟的，不只艾恺，还有一位在由威斯康辛大学到南京大学访学的博士生林琪（Catherine Lynch, 1949—2015）；而且据梁漱溟所记，林琪在先（《梁漱溟往来书信集》，第 297、377 页）。日后，二人的作品成为英语学界梁漱溟研究的基本读物，《最后的儒家》书名之意“取孟子说五百年后必有王者兴”，以为梁漱溟正是“圣之时者”（同上，第 630 页）。林琪的作品则是她 1989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《梁漱溟与中国的民粹主义选项》（*Liang Shuming and the Populist Alternative in China*, 2018）。梁漱溟 1980 年回复林琪的信中还提及：“曲阜必需一游，此地有孔林即孔子墓地。有孔府，即孔子后裔住宅。我昔年曾访看，但闻后来被破坏，不知现在是否修缮了，是否有人看护。”（同上，第 158 页）言辞之中，耄耋老人对中国文化固有力量的“看护”之情可见一斑。

吾生有涯愿无尽

梁漱溟一介书生，对文化的看护便是写作，以“笔”为“鉴”，所以对书稿尤其看重。在《儒佛异同论》书稿被“红卫兵”抄走后，梁漱溟致信毛泽东，请求他出面归还书稿：一生数十年唯在一个中国问题一个人生问题所刺激所驱使之下，求其有所解决（前者求其实际的解决，后者求其在思想上的解决）而竭尽其心思气力。中国问题现在由于共产党领导既有一条大道可循，我将集中心力于人生问题之研究，写出《人心与人生》一书，偿其夙愿于余年。（《梁漱溟全集》第八卷，第 79-80 页）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梁漱溟“写信致毛主席，说《人心与人生》未完成之稿必请发还给我。这是性命攸关。不发还，无异宣布我死刑。其他一切无所计较。幸此稿不久寻回”（同上，第 399 页）。

由书稿谈及生死，这正是读书人的命数。熊十力（1885—1968）致信梁漱溟，曾提及于省吾（1896—1984）所说，“凡愿力大者，常恐其生之促”，“或者然乎”？（同上，第 685 页）熊十力以此自比，梁漱溟不也如此？梁漱溟

“过去纵一事无成，今日亦何敢自逸”（同上，第 80 页），许愿“吾生有涯愿无尽”，只为“心期填海力移山”，面对“人心与人生”问题，像移山之愚公和填海之精卫一样，徐徐用力。

梁子曾放出豪言“我若死，天地将为之变色，历史将为之改辙”（同上，第 1034 页），1942 年正值民族危亡之际，梁漱溟此论不是计算个人安危，而是心怀“学术建国”之志，作品未出，身不敢先死；“原系家书，其中有些话不足为外人道”（同上，第 1035 页），是怕后人脱离语境的理解。当时不能死，因为“所负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”（同上，第 406 页）。他所致力写作的便是《中国文化要义》和《人心与人生》。1975 年，梁漱溟终于完成《人心与人生》，写下书成自记：

生当世界大交通之世，传来西洋学术，既非古人囿于见闻者之所及，抑且遭逢世界历史之大变局、祖国历史大变局的今天，亦非在几十年前的前辈人之所及。当全人类前途正需要有一种展望之际，吾书之作岂得已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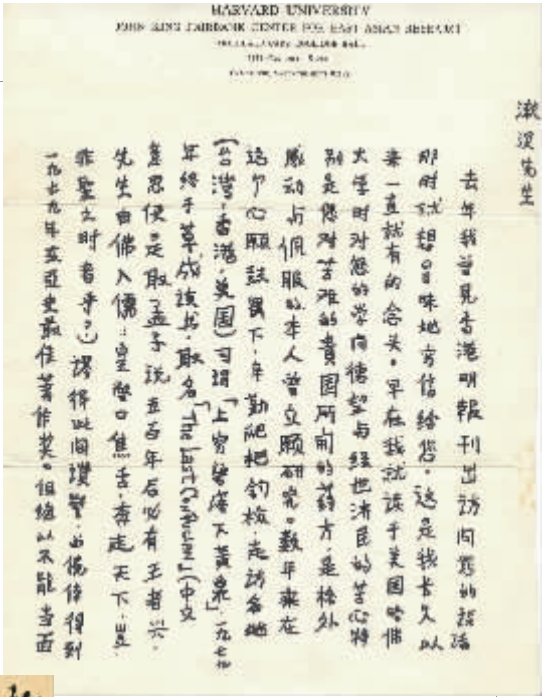
书既已成，所以到了 1976 年，梁漱溟便讲，“今天事情大致完了”，“负有使命而来，使命既完，便自去耳”（同上，第 405-406 页）。

那么在 21 世纪日益繁盛的中国，还有必要阅读已经作古的梁漱溟吗？反思梁漱溟有关乡村、人心与国家前途的思索，可以看到这里原就有对于未来中国之梦的关切。梁漱溟的乡约之论与明清时期政府强制推行的乡约不同，完全起于民间。梁漱溟之学说或可商榷，梁漱溟之观点或有不章，却为思考现代性提供了另一种重要视角（吴飞，《梁漱溟：我的“所见仍然没有错”》，载《北京日报》，2010 年 9 月 27 日）。今天，重新阅读梁漱溟，便是与他一起思考华夏大地的未竟之业。

（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教师）



►艾恺致梁漱溟，1979 年。美国学者艾恺（Guy S. Alitto）在未能亲见传主的情况下写成《最后的儒家——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》（1979）。改革开放后，为印证事实，订正该书未尽正确、周详之处，艾恺 1980 年 8 月特来华专访梁漱溟先生，长谈十余次，后辑成谈话录《这个世界会好吗》（东方出版中心，2006）



◀陈嘉异致梁漱溟，约 1930 年。信中述及自己仅读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一文，便“不禁热血全涌，绕室疾走，满腔欣慰欲狂”。1976 年整理信件时，梁漱溟称此时自己正在主编《村治》月刊，可惜始终未能与陈嘉异相见。

